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

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引领论”的哲学反思

刘 魁 张苏强^{*}

〔摘 要〕 鉴于当代严峻的生态危机,近年来以小约翰·B·柯布、菲利普·克莱顿等为代表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的“中国引领论”,强调中国最有希望引领生态文明,中国应当担此拯救人类文明的全球责任。可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环境问题突出,经济发展任务也很重,所以国际社会对其可行性表示质疑。实际上,“中国引领论”固然存在种种不足,但其核心主张仍然可以成立,因为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难得机遇,不可错过。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对其内涵、理论缺陷及其可行性与实施策略等进行辨析与论证,为提升中国的引领能力服务。

〔关键词〕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中国引领;全球责任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学术界近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曾经以倡导“建设性后现代”而著称的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B·柯布(John B. Cobb, Jr.)、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等。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化、本土化、生态化与有机化的同时,也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引领论”(后文简称为“中国引领论”),强调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认为“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①然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许多人纷纷表示质疑,认为中国无力、也没有资格承担这样的重任。为此,本文将对其理论缺陷及其合理性展开进一步研究,进而探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当代中国引领的可行性与实施策略。

一、“中国引领论”的内涵及其主要依据

在深入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引领论”的困境与可行性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该主张的内涵及其主要依据,这是至关重要的理论前提。尤其需要弄清楚的是,它们为什么把生态文明的希望放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身上,而不是放在公认的全球超级大国美国或者是发展绿色经济最积极的欧盟身上,这也是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的地方。本文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引领论”

^{*} 刘魁,哲学博士,东南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教授,210016;张苏强,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210016。本文是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项目和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研究成果。

^①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中译本序)孟献丽、于桂凤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页。

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中国是最有可能引领。因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国策，已经在引领中国发展，其他国家大多是在工业化的同时注意环境保护，还没有认真考虑生态文明建设，有些人甚至反对“生态文明”的提法，主张工业文明的生态化。二是中国有责任引领。一方面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大国，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劳动者的共同福祉和全球正义，中国有责任引领；另一方面这是中国的使命，用克莱顿的话说：“要建设新文明，在世界各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的是引领作用，这是她的特殊使命。”^①三是中国后现代发展的出路。当今的生态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现代性的危机，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后现代或者是异质现代性的道路，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道路，引领时代发展的新趋向。

按照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中国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不仅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而且在于它有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在于它有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人口控制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支持：第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重要国策。在当今世界，中国是第一个把“生态文明”作为国策写进政府纲领性文献的国家。“‘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昭示着中国作为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大国已经在扛起这份生态责任。”^②此外，中国政府加大投资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建设方面，积极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更是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新常态意义上的发展战略转轨，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③，努力建构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二，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大国，生态文明建设有可靠的制度保障。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私营经济及金融机构有良好的控制力，广大的社会公众利益是其首要考虑的对象，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制度保障。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军事集团与金融集团等利益集团所左右，其决策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出于资本追逐利润增长的本性而不可能真正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第三，中国有着十分丰厚的有机主义的文化传统，整体和谐意识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文化保障。中国古代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强调顺应自然，儒家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反对捕鱼苗、逮幼鸟，佛家强调尊重生命，主张吃素，反对杀生，保护动物，这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文化传统保障。相反，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原子主义和碎片化，强调个体意识与个体权利，对生态文明发展不利^④。第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已经具备了建成生态文明的人口控制与公众支持基础。从人口控制方面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人口总量进行很好的控制，中国过去30多年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经济发展、资源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从公众支持方面说，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生态问题很严重，尤其是雾霾、化肥与农药污染激发了社会公众对环境安全、乃至生态安全的渴望，所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拥有广大的民众共识，非常有利于创造性的生态文明建设。相反，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人口控制政策，社会公众关注的是人权与消费水平问题，对环境保护支持力度有限，这从各国大选领导候选人的竞选主张可以看出端倪。第五，中国具有引领世界发展的实力与文化传统。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大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对东亚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按照著名学者大卫·格里芬的说法，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文明，但它从未试图征服世界，在近现代史上又有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悲壮经历与丰富经验，目前又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使它容易赢得抵抗帝国主义侵略、领导世界发展的全球信任，因此最有希望领导

①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中译本序）第9页。

② 柯布、刘昀献：《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③ 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0页。

④ 小约翰·B·柯布、杨志华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观》，《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

世界走不同于西方的新型发展道路^①。相反,美国等发达国家则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作祟,财富过度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少数人就基本控制着国家的财富,无止境地追求经济增长、财富增长与全球霸权,指望他们引领追求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无异于与虎谋皮。

二、对“中国引领论”理论缺陷的反思

毋庸置疑,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中国引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中国的环境污染还比较严重,尤其是中国的碳排放目前已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对中国引领的公信力构成了严峻挑战。此外,中国的文化传统、公众支持、人口控制等方面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引领不仅存在有利的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这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地方,对此,我们需要认真辨析。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固然历史悠久,但它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对生态文明建设影响有限。比方说,中国古代强调:“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鱼鳖鳬膳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这是基于人类的同情心的拓展与延伸,是基于对幼小生命的同情与爱护,是基于中国传统阴阳五行论的推演,过了这个季节或时期,人们就可以上山砍伐山林,就可以下河捉捕鱼捉鳖,与当代基于物种濒危的生态危机而强调动物保护有很大区别。此外,中国古代不仅有崇尚节俭、淡泊名利的儒道释等精英文化,而且有各种类型崇尚奢靡、追求显达的世俗文化,其中有许多因素往往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其次,当前的经济新常态、尤其是分配领域不平衡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力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长期的高速发展及其给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人们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分配失衡问题的关注要高于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许多人看来,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分配公正更重要。至于中国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问题,则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再次,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固然对经济发展贡献不菲,但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就人口结构而言,中国目前虽然已经很好地控制了人口规模,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空巢以及社会养老等问题,也给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以至于中国政府近年主动调整人口政策,从严控一孩政策调整为鼓励二孩政策。即使这样,社会上仍然有许多人主张彻底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以缓解人口危机。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就业问题、养老问题以及人口红利透支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最后,中国目前虽然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但是由于种种缘故,中国的环境保护、乃至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巨大考验。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的新型现代化建设,并针对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倡导“创新”、“协调”等新发展理念,但是,由于中国后发现代化的冲动、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和市场经济的利润冲动,其中的“协调”与“绿色”发展理念经常受到冲击,相互之间构成一定的张力。

三、“中国引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引领论”固然存在上述的种种不足,但是,该理论的核心观点仍然是可

^①王治河:《中国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7期。

以成立的。因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尽管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中国承担引领生态文明发展的全球责任。对于中国来说,这既是一种责任、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民族复兴与文明崛起的时代机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是拯救人类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赋有引领生态文明的历史使命。众所周知,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等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危机,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固然不能完全避免气候变暖等带来的种种恶果,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危机,让人类把精力从发展经济、追求财富转移到拯救生存危机上来,这是任何人类、任何国家都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强大、活力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信奉的是追求全球正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太情愿积极承担这一全球责任的背景下,理应毫不犹豫地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肩负引领生态文明的责任。

其次,目前国际格局正处于调整期,这是中国提升领导权的罕见机遇,不应该错过。在全球,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因金融危机及对外军事干预过多而复苏乏力,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处于经济调整期,中国作为活跃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剧烈的调整期,这是一个中国进一步提升领导权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此问题上,即使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由于产业结构与发展战略的调整面临下行的压力,我们也要从大局着想,克服困难,勇担责任。

再次,就国内而言,生态文明建设虽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但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与制度优势,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中国虽然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但压力也会变为动力,容易形成全民共识,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此外,中国有悠久的农业生态治理的历史,有丰富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治理经验,有开放的超越民族意识的“天下”意识,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传统,又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突出成就,已经超越了“脱贫”阶段,这时人们关心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①这些都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引领生态文明发展,既是拯救人类文明和时代转型的需要,也是中国文明崛起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崛起,民族复兴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还要实现文明的崛起。目前人类正在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工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人类不可能在对工业经济修补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西方文明由于现代性与后现代、工业与后工业的冲突,自然面临转型的巨大阻力,中国的工业文明还不够发达,传统的农业文明历史悠久、根基深厚,与后工业、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具有内在的价值相通之处,面临转型的压力要比西方小,所以,生态文明发展不仅是拯救人类文明的需要,也是中国文明崛起与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理应把握机遇主导引领,不可错过。

四、“中国引领”的可能方式与实施策略

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引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担心“中国引领”的方式与实施策略问题,这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无疑,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有义务、也有责任去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盲目引领、盲目包办,必须要认真考虑引领的可能方式及其实施策略问题。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事关全球人类命运

^① 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230页。

的大事,在全球多极化的时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任务还很重,面临的挑战也很多,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去包办,更有可能强制要求其他国家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去发展,需要全球协作,尤其是需要全球大国、国际权威机构(如联合国)、包括跨国企业等共同协作,只能在多边协商与互动中发挥大国的行动示范与方向引导作用。目前国内许多人不愿意中国承担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主要还是担心我国承担过多的全球责任,会影响自身的发展速度与生活质量。实际上,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有各种方式,行动示范、方向引导是一种方式,组织领导、带头出资或者全力主导也是一种方式,号召或者呼吁也是一种方式。在目前中国的发展任务还很重、生态问题还很严峻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发挥全球推动、国内发展示范、体制创新以及方向探索作用,在发展中起“领航”的作用,这也许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引领方式。

对于中国引领的资格与权威性问题的,许多人也疑虑重重,总认为中国自身的生态问题就很严重,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引领全球的生态文明发展,缺乏一定的公信力与权威性。这种疑虑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尽然,其中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缺乏全面的了解。实际上,中国已经在以某种方式起引领作用。在理论上,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角批判西方现代性及其工业文明,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的拯救与重构过程中起到了探索与引领作用;在发展道路上,中国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国策,积极探索“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本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改变了过去的GDP至上模式,实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转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具有一定程度的价值引领性与发展示范性。在实践上,在近年全球热点的气候治理领域,中国与美国作为两个世界大国2015年共同签署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巴黎气候大会签署《巴黎气候协定》奠定了基础;在气候治理成效方面,中国的碳排放增速自2005年以来已“稳步下降”了大约30%,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33.8%,引起全球关注;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中国的发展目标起到了引领发展作用。2015年7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令人鼓舞的减排目标,按照该减排目标,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低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增加45亿立方米,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反响。

一句话,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已经在国际社会起到了方向引导与价值引领作用,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察觉,为我们自己的环境问题所遮目。当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目前自身的生态问题还是很严重,尤其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所以,本文认为,生态文明的中国引领目前只能是一种发展道路、价值理念、国家战略、治理体制意义上的引领,简言之是一种“领航”意义上的初步引领,其余则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化。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让广大民众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树立真正的信心。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中国引领的实施策略问题。既然“中国引领”应当是一种领航意义上的引领,那么,我们就不仅要搞好自己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以自己的成功经验引领全球发展,还要在理论上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指导,加强本土生态治理的历史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化及其基础理论研究,为引领生态文明的时代发展服务。

其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创新,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生态文明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一些人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唯生产力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以致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类中心论”,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为当代人类的生态危机负责。实际上,发展生产力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其社会发展的一个手段,消灭三大差别,消灭人的异化、消灭社会异化,实现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

的根本目的。早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在19世纪许多人还沉湎于近代科技取得巨大成就的欢愉之时,恩格斯理性而又严肃地发出了“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胜利的警告”。事实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①因此,在引领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还需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化,提升生态文明的引领能力。

其二,我们要加强中国本土化生态系统及其治理经验与治理历史的研究,以中国特色的治理经验引领生态文明发展。中国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史,有丰富的生态治理经验,我们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引领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本国生态系统及其治理经验的系统研究与历史研究。受生态危机的影响,一些学者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生态伦理视角批判工业文明与现代性,以西方后现代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应然”视角看待一切,强调生态中心主义,反对发展高科技,另一些学者片面强调学习西方的环境保护经验,忽视中国本土悠久的生态治理经验与生态智慧,对中国生态系统自身的演变规律缺乏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指导下,加强对本土生态系统及其治理经验的科学研究,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提高本土生态智慧的引领能力。

其三,我们要加强全球化视野的生态危机理论研究,提升中国的引领能力。生态文明的中国引领意味着中国要引领全球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要加强全球战略研究,坚持全球正义与全球视野,超越民族主义。按照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的说法,人类目前正在从工业时代进入到全球风险时代,气候变暖、能源危机、资源短缺、核威胁、转基因技术等都是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不是任何一国单独可以解决的。可是,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片面强调民族利益至上,忽视了生态问题的系统性与全球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是全球视野的风险治理与文明引领,因此,我们在引领过程中要加强全球战略研究,提升战略引领水平。

其四,我们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生态文明的文明内涵、特征及其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复杂关系,以卓越的生态智慧引领生态文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引领离不开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是在“工业文明的对立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工业文明的补缺面”的意义上理解生态文明的,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工业化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生态化,是否恰当,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我们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引领生态文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在实践上,为提高引领水平,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也要做好以下工作,走出误区,切实起到引领时代发展的作用。第一,生态文明的中国引领意味着用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进行生态发展引领,坚持生态正义,反对生态霸权。所谓“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文明”意味着对生命、对制度、对和平的尊重,反对野蛮与暴力。生态文明意味着对各种生物生命的尊重,意味着对生态保护规章与制度的尊重,意味着对生态和谐与万物共生的尊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帝国主义等生态霸权行为。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环境保护方面虽然做得很好,但是有时为了人类的清洁发展而大量开采地下资源,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或者为了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环境,有时不惜损害他国的利益,把污染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破坏他国生态环境,消耗他国的资源,这就是典型的生态霸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国际生态文明引领过程中,都要坚持生态经济的文明发展、生态社会的文明建设,反对各种形式的生态霸权,既不能把生态危机转移给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转移给本国落后的地区,更不能用为了发展经济野蛮破坏生态环境,要用不同于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引领生态文明,引领时代发展。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事关全球的文明发展

①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6页。

事业,中国的环境治理、乃至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我们需要从全球化的视角处理生态问题,开阔视野,增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引领信心。第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完整的生态文明建设,而非简单的生态文明指标建设,所以在生态文明引领与建设过程中需要辩证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其指标之间的复杂关系,走出指标主义、短期发展的思想误区。长期以来,出于生态治理操作简便的需要,我国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以生态文明建设指标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目前我国主要参考三个领域的指标体系进行建设:一是参考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生态县(含县级市)、生态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指标体系(2007年修订稿);二是参考国家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三是参考新农村建设的指标体系。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主要存在以下缺陷:一是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主要从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层次设计和考核,对于社会进步的指标设计太少;二是参考性指标偏多,在实际考核过程中缺乏较好的可信度和可操作性;三是指标体系和考核方式均没有与考核所在行政区在国家、区域主体功能区中的生态、经济功能区结合起来,这样就导致考核缺乏可比性、可操作性;四是规划大多基于现有资料,对现有区域和产业状况进行评价,对未来区域发展和产业布局进行规划,缺乏监督机制和跟踪评估方法^①。因此,我国需要完善有关规划与评估指标体系,以便为引领生态文明发展服务。

总之,引领生态文明,就是引领一个新的时代发展,对于中国来说,这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应尽的国际责任,也是一个提升本国在国际体系话语权与领导权的难得机遇。当然,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任务都还很重,所以,中国引领的可行性与权威性还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需要靠自己的视野、能力及成就(目前尤其需要用生态治理成就)来证明。借用当代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的话说,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指导,中国就有能力改变当前通行的西方治理游戏规则,甚至爆发一场“生态革命”,从而“再次震撼世界”,引领全球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实现人类发展的新跨越。

(责任编辑:王永贵)

Organic Marxism and Its Proposal of “China’s Leadership”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LIU Kui, ZHANG Su-qiang

Abstract: Facing serious ecological crises, organic Marxists like John B. Cobb, Jr. and Philip Clayton proposed the notion of “China’s leadership”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m, China is the most likely nation to take the leading role and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aving human civilization globally. However,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facing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daunting economic tasks, so the feasibility of their proposal is questio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espite its deficiencies, the thrust of their theory is essentially correct.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 should take but also an unparalleled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rise up as a big nation.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China’s leadership”, plug up its theoretical holes, improve its feasibility and explor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so as to help promote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Key words: organic Marx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s leadership; global responsibility

^① 白杨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评估体系研究进展》,《生态学报》2011年第10期。